

孔子研究院
洙泗文庫

一



美国华裔史家 历史解释研究

路则权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二级出版社

美国华裔史家 历史解释研究

路则权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二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研究 / 路则权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209-07772-9

I. ①美… II. ①路… III. ①史学—研究—美国
IV. ①K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1679 号

责任编辑: 王 晶



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研究

路则权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 × 24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772-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888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14
第一章 域内与域外:华裔史家的社会文化背景	16
第一节 故国烙印	16
一、中国情怀	16
二、家庭熏陶	18
三、学校教育	21
四、社会体验	25
第二节 异域冲击	30
一、二战后美国史学及中国学的发展	30
二、西方文化的启发	34
三、非华裔学者的影响	38
四、华裔学者的反思	44
第三节 华裔史家的学术交游	46
一、二战后第一代华裔史家群体——以杨联陞为中心的考察	46
二、二战后第二代华裔史家群体——以余英时为中心的勾勒	53
第二章 华裔史家学术成就与史学转向	61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61
一、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发展	61
二、中国传统经济的宏观显现	64

三、汉代经济社会史	66
四、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	70
五、明清经济社会史	73
六、中国近代化问题	86
第二节 思想文化史的沉思	93
一、西方思想文化史的演变	93
二、汉代思想史	95
三、宋代文化转向	98
四、清代思想转型	100
五、“五四运动”情结	108
第三节 新文化史领域的学术转向	112
一、新文化史与美国中国史研究	112
二、寻找中国“现代性”	115
三、宋代政治文化史	120
第三章 美国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类型	126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史解释类型	126
一、“传统—近代”解释的认同	127
二、“传统—近代”解释的修正	133
第二节 思想文化史解释类型	146
一、外部力量影响论	147
二、内部力量影响论	151
三、内外互动影响论	157
第三节 新文化史解释类型	159
一、“现代性”书写	160
二、政治文化史新方向	164
第四章 华裔史家大视野、跨学科研究模式个案分析	172
第一节 社会科学解释——许倬云模式	172
一、许倬云的世界整体史观	173
二、网络系统论	182
三、宏观比较论	187

第二节 人文解释范式——余英时模式	197
一、人文多元史观	198
二、主客统一论	207
三、史无定法	212
结 论	228
一、前见——华裔史家理解的积极性	230
二、时间距离——华裔史家解释的双重性	231
三、效果历史——华裔史家解释的目的性	235
四、历史解释视野下的“华裔史学”	237
参考文献	238
附 录	259

绪 论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一) 研究对象

“美国华裔史家”，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新中国与美国建交前留学或移居美国并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①。这批学者与早年留美的知识分子尽管关系密切，不同之处在于早年留美学生多数并无在美国学界长期立足的打算。他们也不同于中美建交尤其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移民或留美学生。因此，这一时期的华裔史家有自己的问题关怀，也就形成独特的历史解释风格。需要指出的：一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学人与我国港台地区关系较为密切，有些人常常来往于其间，甚至具有中美双重国籍。二是美国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较强，因而有些学人未必只是从事历史研究。

一般而言，美国华裔学者的学术属性多归美国中国学（汉学）范畴。我们试图跳出这一思维，深入观察这批学人的特征。因为这批学者都没有逃脱时代、社会和教育等大背景的熏陶^②。他们的职业选择、历史解释无疑都与此相关。正如黄宗智的观察，他说：“一般来说，第一代乃至第二代海外华人都有很强的双重文化背景，到了第三、四代则弱得多。”^③当然，黄宗智强调的是一代华人和二代华人的相似之处，并未涉及两者之间的区别，但这种观察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在此，我们选取历史解释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这种方式具有马克斯·韦伯说的“理想型”。事实上，观察华裔史家的思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

^① 包括这一时期由港、澳、台赴美的中国学人，也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及在美期间著述影响较大的学人。

^② 韦伯在研究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从事职业不同的原因解释中，也强调了故乡、双亲和宗教所制约的教育因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③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若举出几个不符合我们所论述的个案事例也并不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整体的观察。

(二) 选题意义

1. 海外中国学与中国史学及史学史研究互相促进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内外出现了中国学的研究热潮。那么,如何进行海外中国学研究呢?李学勤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①。这种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例如,朱政惠指出:“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史学史研究对推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意义是双重重要的。”^②我们也认为,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史学的发展,借鉴国外研究理论、方法和思路,吸取经验教训是必需的。对于中国学而言,从学科角度介入,成为研究海外中国学一条可行的路径,因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跨学科性质明显。在强调学科交叉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从学科属性进行深入探讨。而美国中国学是一门以历史研究为主干,结合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从史学史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符合其学术发展脉络。

2. 美国华裔史家研究的重要性

在美国中国学迅速发展时期,华裔学者功不可没。当时已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约翰·M·H·林白克在他的《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中说:“到了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400多位中国学学者中,华裔(无论是否加入美国国籍)可能占三分之一。”^③当然,林白克强调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本土中国学家汉学水平比较低。但也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华裔学者的重要性。这一点也被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者所证实。如德国中国学研究者指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所以具有优越性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拥有许多华裔学者,这一点德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白其重要性。只有傅吾康教授在担任汉堡教席时,于五六十年代曾经很注重这点,凡有教职空缺,他就尽可能地聘用华裔人士。”^④当然,美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第62页。(此外,笔者专门写信请教朱政惠老师,他在回信中重点提到了从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角度研究华裔史家是可取的。2010年3月31日邮件。)

③ John M.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 New York, 1977, p. 55.

④ 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前言”,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国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转折,许多华人学者出于种种原因相机赴美。吴原元指出:“据统计,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各大学任教或从事研究的华人学者已接近两千。”^①

当然,数量不等于质量,而且就华裔学者来说,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许多华裔学者迫于生计和美国学界的实际状况,多从事汉学教学任务。李幼蒸指出:“对于汉学界华裔学者来说,由于教学系统内语言本身的限制,又难以深入开展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②但我们所强调的是,在这种境遇中,美国华裔学者中的优秀者,不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事实上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萧公权说:“‘汉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移到新大陆。这是可喜的现象。但过速的进展引发了一些缺漏。我不禁想就个人薄弱的能力所到,做一点补苴的工作。”^③杨联陞对美国中国学界“望远云而误以为林”(借用傅斯年语)也同样引起萧公权的共鸣^④。他们的友朋弟子们,如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汪荣祖等也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他们出生在中国,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大部分时间学习、生活在美国及海外,有着世界眼光和比较意识,这种生活学习经验使得他们具有比较宽广的历史解释视阈。

与其他史家群体相比,美国华裔史家研究这一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对于美国史学界来说,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处于边缘,而华裔史家又几乎在边缘的边缘。中国史学界对于其他海外中国史家的关注度,显然超过对华裔史家的关注。深入研究华裔史家的重要性在于既可以拓展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本身的研究领域,又能推动中国史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中国学的海外影响。

3. 历史解释为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维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哲学的实践性,但并不是反对其解释作用,而是反对二者的割裂状态。解释学的哲学探讨与史学中实际运用之间同样存在着鸿沟。实现二者的结合需要对历史解释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史学史学科而言,徐

① 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② 李幼蒸:《历史和伦理:解释学的中西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③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19页。

④ 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

⑤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兆仁认为,历史解释将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途径是历史解释学^①。我们试图以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来分析华裔史家的历史研究。当然,历史解释所面对的既然是整个世界,它既是方法,也是本体^②。

华裔史家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概念。华裔是族群的事实性认同,但伴随着文化的传播、互动与变迁、更新,华裔史家的文化身份也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他们逐渐形成了多重建构性认同,也只能如同他们自己一样,采用融合视域和整体框架探究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解释的路径、方法与效果。

二、学术史回顾

(一)美国中国学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就开始注意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进展,如1978年的《外国研究中国》,1979年的《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1980年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的《美国中国学手册》(有1986年增订本)等,这些尽管不很全面和深入,甚至出现一些错误,但都为了解美国中国学提供了基本信息。

随着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升温,许多丛书、译丛不断涌现。比较著名的有: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此外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丛书”;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丛书”;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花城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东学西渐》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海外江南城市研究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等。

连续的期刊出版物也日渐增多。如:张良春主编的《国外中国学研究》;陈学超主编的《国际汉学论坛》;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

① 徐兆仁:《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在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对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解有失偏颇。伽达默尔的本义是强调现代科学方法无法认识人文科学中的真理。他完成了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但并不反对方法。他说:“这样的解释给人一种片面的印象,似乎精神科学中不存在什么方法。方法当然是有的,而且人们还必须学习它们,运用它们。”(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页。)

究》;陈仁凤主编的《汉学漫步》;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吴兆路、金伯昀主编的《中国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国际汉学集刊》;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海外中国学评论》等。

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不断设立。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外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等近10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汉学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9年国家图书馆成立“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

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5年在海南召开“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清华大学主办了“20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主办了“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2006年、200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连续举办三届。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举办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2009年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两届世界汉学大会。2010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了“杜希德与20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学术座谈会,计划以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为个案,观察以欧洲为代表的“东方学”之汉学是如何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研究”之汉学的^①。

值得关注的是,从史学史角度入手研究美国中国史的专著、论文,近年来不断增多。例如,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张注洪、王晓秋主编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胡志宏的《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考察》等。

相关论文尽管很多,但较为宽泛。值得我们从史学角度注意的,主要有刘广京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②,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③。朱政惠的《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④为史学史研究者所关注。张仲民的《海外汉学掀起新文化史

① 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即崔瑞德,与费正清主持《剑桥中国史》的编撰,著名的唐史专家。

②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③ 《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

研究热》^①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研究在西方史学中的发展。关永强的《从欧洲中心史观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变迁》^②回顾了欧洲中心史观的几种主要理论依据,然后以此为参照背景来考察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历程。

就个案研究来看,首先是对费正清的研究。陶文钊在《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③一文中指出,费正清是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海人不倦的导师。侯且岸发表了《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④。还有不少硕士、博士论文。如,杨婉蓉的博士论文《费正清及其中国史研究》、宋自立的硕士论文《费正清的中西关系史研究及其“冲击—反应”模式》等。当然对列文森、史华慈、史景迁也有不少研究。如陈建华的《雷文森与儒家中国的现代命运》^⑤、杨华的《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特点》^⑥、朱政惠的《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⑦、马金生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治史观——美国史学界对史景迁著史风格的不同认知》^⑧等。

美国中国学在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不少国内学者的反思。杨念群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⑨提出我们的研究如何重新书写历史的问题。喻中在《海外中国学:一面模糊的镜子》^⑩一文中指出,对于海外中国学,单方面的过度褒扬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既没有坚持“允执其中”的立场,也无助于引导国人客观地了解、理性地对待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严绍璁认为目前的中国学界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学术性的工具”的观念,往往是建立在对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导致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缺乏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尽管他以日本为例,但仍值得我们反思^⑪。葛兆光、盛韵提醒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

① 《社会科学报》2008 年 8 月 7 日,第 7 版。

② 《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③ 《历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④ 《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⑤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⑥ 《历史教学问题》2003 年第 1 期。

⑦ 《文汇报》2007 年 1 月 4 日,第 12 版。

⑧ 《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⑨ 《清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⑩ 《中国图书评论》2007 年第 9 期。

⑪ 严绍璁:《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2 期。

是“外国学”。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其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①。张效民对美国中国学的概念、分期、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②。温儒敏对“仿汉学”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国内一些学人在借鉴海外汉学时盲目模仿跟风,“主动”失落了学术个性与自信^③。

(二) 华裔史家研究

如前所述,关于华裔史家的相关研究,多列入美国中国学框架内加以论述。即使单独成文,也多为个案研究。在论著中,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提到杨联陞、余英时、刘广京等。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对黄宗智的理论和何炳棣、张仲礼、萧公权、瞿同祖的“乡绅社会”研究进行了评述。胡志宏的《西方中国史论研究导论》是相对集中研究华裔史学家的专著,对华裔学者何炳棣、张仲礼、萧公权、瞿同祖、许倬云、张光直、刘子健、陈启云、黄仁宇、黄宗智等人均有涉及,并简要分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论文则多为个案研究,简要介绍如下:

萧公权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康有为的研究等方面均有成就。目前学界多集中于其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如张允起的《萧公权的民国宪政论》^④、羽戈的《萧公权的宪政观——〈宪政与民主〉评述》^⑤、陈克艰的《思想的理解与考证——读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点滴》^⑥、孙宏云的《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析》^⑦、张丽的《萧公权宪政思想研究》^⑧。对于其学术史贡献,有肖俊的《萧公权:会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典范——兼论会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⑨、“融和东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江西籍学人萧公权学术思想管窥》两篇文章^⑩。

① 葛兆光、盛韵:《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第6版。

② 张效民:《国内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

③ 温儒敏:《“仿汉学”更容易出活儿》,《文汇报》2009年10月31日,第1版。

④ 《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⑥ 《史林》2007年第5期。

⑦ 《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⑧ 吉林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

⑨ 《学术界》2004年第5期。

⑩ 《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而对于他的制度史研究较少,有丁卫的《乡村控制:萧公权对帝制中国晚期社会的探究》^①。萧公权的弟子汪荣祖因《史传通说》一书为学界所称道。汪的晚清思想史研究也成绩斐然,如《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政治思想史研究》《康章合论》等,但学界论述不多。

杨联陞尽管在美国中国学界为人所熟知,但在国内关于他的研究者并不多。仅见徐小玲的《论杨联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通过对杨联陞学术人生历程与学术渊源的探讨,重点分析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②。

余英时为史学界所熟知。钱钟书认为余英时“海外独步”,李泽厚说:“余英时被公认为中学功底相当好,远超过其他人。”孙勇才认为余英时的学术思想是今天中国人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③。侯宏堂对余英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论述^④。田愿静激的《余英时的明清学术史研究——以〈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和章学诚〉为例》^⑤,对余英时学术发展的内在轨迹做了分析。刘苏里将史华慈与余英时相比较,指出他们有着惊人一致的学术志向——对人类问题的“关切”,具体地说,两位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史华慈将中国作为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余英时“关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⑥。近年来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大陆史学界反响较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评价。包弼德从史学方法角度评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⑦。陈来指出了钱穆与余英时在朱学研究上的区别^⑧。田浩从史学方法角度指出,在北美汉学界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社会史方法研究宋代知识分子的门径,余英时在这一门径之外开辟了另一条路^⑨。葛兆光、张国刚、李存山、阎步克、邓小南等对该著作也颇为赞赏。

许倬云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特别注重治史方法的探索和创新,但其学识和思想深入研究者并不多见。程念祺的《许倬云〈汉代

①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论文。

③ 《余英时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构建》,《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④ 侯宏堂:《“新宋学”之建构 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硕士论文。

⑥ 《史华慈与余英时:人类良知》,《学习博览》2007年第1页。

⑦ 《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⑧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0页。

⑨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世界哲学》2004年4期。

农业》商榷》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其解读的某些史实的失误^①。陈启云的《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认为该著作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由于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导致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②。

林毓生撰写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引起国内思想界的关注和争议。赞同者如崔之元的《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之际》^③、蒋劲松的《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再读林毓生》^④、盛邦和的《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⑤等。反对者如郑大华的《“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兼与林毓生教授商榷》^⑥、刘长林的《试论陈独秀评判孔子之道的历史作用——兼与林毓生“陈独秀全盘反孔说”商榷》^⑦、李良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⑧等。

史华慈的弟子张灏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成就为学界所认可,他提出的“幽暗意识”影响颇大。但对其论述评价者并不多见。主要有崔志海的《寻找一个真实的梁启超——亦评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⑨和《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后者以李文森、张灏、黄克武三人的著作展开述评^⑩。另外蒋贤斌的《历史人物思想研究三题——以张灏的研究为例》主要考察其研究方法^⑪。

费正清的弟子刘广京尽管为我们所熟知,但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者也不多见。他的思想在麦金农、周启荣、黎志刚的《刘广京学术观点举要》一文中有论

① 《史林》2000年第2期。

② 《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

③ 《读书》1986年第7期。

④ 《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6期。

⑤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⑥ 《求索》1992年第4期。

⑦ 《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

⑧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⑨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3/4期。

⑩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⑪ 《求索》2006年第4期。

述,认为对19世纪中国最有贡献的是其有关政治和制度史的著作^①。

周策纵是国际知名的红学和五四研究学家。就史学方面,介绍者较多,评论者较少,有王润华的《周策纵:学术研究的新典范》^②、王睿的《评周策纵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③等。

因《万历十五年》为国内多数人熟知的黄仁宇,学界多集中评论其“大历史观”。如卢敦基的《“大历史”与个人经验——黄仁宇先生之史学贡献》^④、孙乐涛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黄仁宇“大历史”观述评》^⑤、张永理的《黄仁宇大历史观析论》^⑥、张燕波的《黄仁宇与中国历史研究》^⑦等。

唐德刚因其口述史学的成就为学界所称赞。钟少华称其为现代最早搞中国口述历史的专家^⑧。张广智认为“他为现代口述历史的复兴运动做出了贡献”^⑨。就其口述史著作,《胡适口述自传》中的注释部分被人称道。如,杨金荣认为:“他的注释大大丰富了胡适自传的史料价值。”^⑩朱旭晨认为:“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注释不仅是一座桥梁,而且是研究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的范本。它种类繁多,内容广博,注中有评,传中有传,高度提升了口述自传的文本价值。”^⑪《顾维钧回忆录》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如台湾学者袁道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巨著——顾维钧先生口述自传经过》、刘绍唐的《关于顾维钧先生和他的回忆录》以及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等。该三篇文章从各自的角度对《回忆录》进行了不同的评价。

黄宗智的“内卷化”“过密化”理论为我们所熟知,《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均有相关评论文章。对其理论进行评价的学者如在美国的迈尔斯(Ramon Myers)、赵冈、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中国的有李根蟠、林甘泉、经君健、秦晖、俞金尧、庞卓恒、侯杨方、侯且岸、侯建新、王建革、行龙、杨念群、汪敬虞、史建云、黄敬斌、高寿仙、赵轶峰等。

①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③ 《考试周刊》2008年第25期。

④ 《书屋》2001年第10期。

⑤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 《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⑦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⑧ 《中国口述历史漫谈》,《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

⑨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历史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

⑩ 《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胡适晚年研究管见》,《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

⑪ 《〈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北方论丛》2005年第1期。

较为集中论述他们观点的文章见赵冈的《评黄宗智过密型增长的理论》^①《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②。此外,张家炎在《如何理解 18 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详细论述了彭慕兰与黄宗智的辩论^③。目前对黄宗智的法律史研究也有一定成果,王洪兵、张思的《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对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的概念进行分析^④。汪雄涛的《功利:第三种视角——评滋贺秀三与黄宗智的“情理——法律”之争》评价了他与滋贺秀三对中国古代法律认识的不同,认为滋贺秀三夸大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不确定性,而黄宗智在纠正滋贺秀三观点的同时也陷入了狭隘的立场^⑤。万亿的《法律史的思维世界——以黄宗智先生的法律史研究理路为范例》则探讨了黄宗智的法律史研究^⑥。

新文化史领域,以对李欧梵的研究为主。彭松、唐金海在《海外华人学者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传统因素——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为例》一文中有评论^⑦。李欧梵在上海现代性研究上受人关注。练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的颓废和城市——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⑧,朱崇科的《重构与想象:上海的现代性——评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⑨,唐金海、陈正敏的《想象的有我之境——现代性与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想象》^⑩均有论述。近年来,在硕士论文选题上也受青年学子青睐,如华中师范大学 2005 届硕士盛中华的《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苏州大学 2007 届硕士张静娴的《现代性的追求——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郑州大学 2007 届硕士徐志强的《论李欧梵的上海现代性研究》等。

此外,回国定居以法律社会史闻名于美国中国学界的瞿同祖尽管为人所称道,但研究其思想者并不是很多,《清代地方政府》一书的翻译者范忠信发表了《译读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一文^⑪。孙国东的《功能主义“法律史解

①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④ 《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⑤ 《学术界》2008 年第 1 期。

⑥ 西南政法大学 2009 届硕士论文。

⑦ 《文学评论》2007 年第 5 期。

⑧ 《文艺研究》2005 年第 8 期。

⑨ 《浙江学刊》2003 年第 1 期。

⑩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⑪ 《环球法律评论》2004 年第 4 期。